

诗学研究  
品读经典



遠

京派文人系列丛书

去的背影

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



李生滨 田燕 ·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诗学研究 品读经典



远

京派文人系列丛书

去的背影

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



李生滨 田燕·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 / 李生滨，田燕  
著. --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9

(京派文人系列丛书)

ISBN 978-7-5601-6434-2

I. ①远… II. ①李…②田… III. ①朱自清 (1898~1948) - 人物研究②朱自清 (1898~1948) - 诗歌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275号

书 名：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

作 者：李生滨 田 燕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李国宏 宋睿文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436千字

ISBN 978-7-5601-6434-2

封面设计：吴海燕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0年9月 第1版

2010年9月 第1次印刷

定价：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 缘起

文学对于人性的审美关怀，传承了“诗教”文化的精神命脉，启迪着自由独立的个性思想，“京派”作家的人文情怀，超越了时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的审美精神。

“京派”是学院派，“京派”是自由文人。20世纪20年代有老“京派”，30年代有新“京派”。“京派”是五四人文主义思想的自然发展和历史丰沛。

朱自清和周作人是典型的“京派”文人，废名和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凌叔华是五四“闺秀派”才女，林徽因是30年代“京派”的灵魂，萧乾是“京派”最活跃的小老弟，朱光潜和刘西渭是30年代“京派”的优秀批评家，汪曾祺是“京派”遗留的最后一个文人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著述已经成为经典。人类抒情言志的精神活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上却有着相同的审美经验，“诗学”包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意味，借此可以探照人生的自由追求和艺术的古雅情怀。从“诗学研究”走近京派文人，从“品读经典”分享心灵华章，你将领略“京派”文人的永久魅力。

“京派”带给我审美的喜悦，偏爱“京派”作家的作品，欣赏他（她）们丰盈而开阔的人生追求。十多年品味“京派”，想把他们的人生阅历，把他们的经典著作，介绍给所有喜欢读书的人。缘于这样的私心所爱，与九头狼书社的总编辑贺秀红女士，有了书香当茶的心灵契合，因为她也是我文学批评集《雕虫问学集》和《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两书的责任编辑，同样喜欢京派的温润和深厚，促成了这个系列的合作。不顾粗疏和浅陋，在与四方来学的年轻人读书论学的合作中，将这样一套品读“京派”文人的评传性研究丛书，贡献于所有追求人类诗意情怀的读者眼前，求教大方。

湟水 李生滨

2009年12月6日于贺兰山清风山庄

缘 起

## 上 编 朱自清与“京派”文人

引 言 .....	003
第一章 少年书生 扬州才俊 .....	011
苏北海州出生 / 邵伯镇和铁牛湾 / 春天书房里的启蒙仪式 / 晚上的私塾 / 辛亥革命和家庭变故 / 扬州梅花岭父亲讲古 / 抵制日货的爱国宣传 / 中学时代的文学梦想	
第二章 北大学子 五四诗人 .....	037
1916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 / 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 / 陈独秀和《新青年》 / 预科提前报考本科哲学门 / 回扬州老家结婚 / 改名朱自清 / 参加平民教育演讲团 / 第五批加入新潮社的会员	
第三章 重返江南 桃李春晖 .....	065
与俞平伯结伴南下 / 杭州一师和扬州八中 / 上海中国公学初识叶圣陶 / 朱自清与《诗》月刊和湖畔诗社 / 朱自清和《雪朝》诗人 / 温州的踪迹 / 宁波四中初识夏丏尊 / 江南师友和白马湖	

第四章 清华学者 出入京派 ..... 097

清华古月堂的新客 / 父亲的来信和《背影》 / 1928年的艰难选择和《荷塘夜色》 / 杨振声的赏识和胡适、周作人的影响 / 《那里走》和“京派”文人的文化立场 / 《大公报》和《文学杂志》 / 30年代最活跃的新文学批评家

第五章 西南联大 学术高峰 ..... 151

卢沟桥的枪声 / 南下长沙 / 文化西迁 / 边城蒙自 / 《诗言志辨》和《经典常谈》 / 《新诗杂话》和《论雅俗共赏》 / 国文教学和叶圣陶 / 诗学研究和闻一多 / 狷介自守的民主立场

第六章 背影远去 文脉长存 ..... 193

1948年夏天无法相信的噩耗 / 师友的缅怀和追忆 / “教授治校”和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 清华大学和现代人文精神 / 文笔风流，文脉长存

下 编 朱自清与中西诗学

引 言 ..... 211

第七章 五四新文学研究的初步实践和学术视野 ..... 217

从新诗创作走向新文学批评 / 《民众文学谈》《短诗与长诗》《〈冬夜〉序》《〈蕙的风〉序》《读〈湖畔〉诗集》《〈忆〉跋》 / 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 /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 20年代新诗发展概观 /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八章 中国新诗批评的理论建树：《新诗杂话》 .....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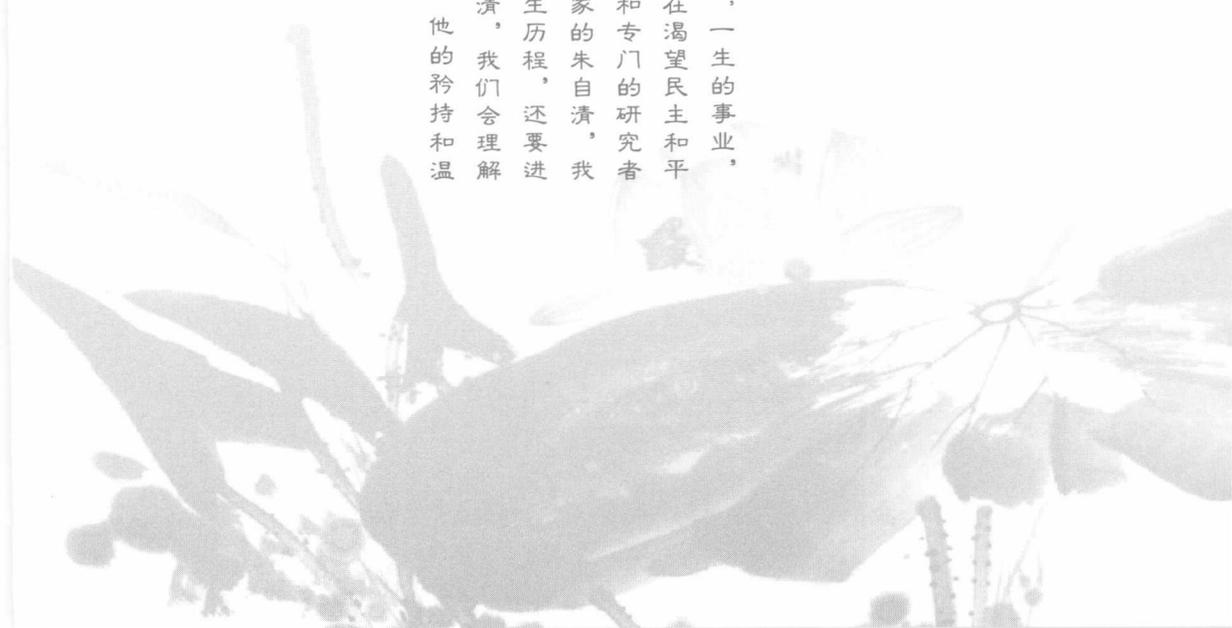
《新诗的进步》《解诗》《诗与感觉》《诗与哲理》《抗战与诗》《爱国诗》《译诗》《朗读与诗》 /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

<b>第九章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先声：《中国歌谣》</b> .....	267
民间歌谣与五四精神的合流 / 《歌谣周刊》 / 作为诗学起源的歌谣研究 / 《粤东之风·序》 / 以古诗笺释为主的诗学审美素养 / 《古诗歌笺释三种》 / 《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	
<b>第十章 中国古典诗学的正本清源：《诗言志辨》</b> .....	299
《诗言志》 / 《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 / 《比兴》 / 《毛诗郑笺释诗》《兴义溯源》《赋比兴通释》《比兴论诗》 / 《诗教》 / 《六艺之教》《著述引诗》《温柔敦厚》 / 《正变》 / 《风雅正变》《诗体正变》	
<b>第十一章 国学典籍的雅俗共赏：《经典常谈》</b> .....	325
中国诗教的文化传统：《经典常谈》 / 诗教与文艺大众化的结合：《语文零拾》 / 文学、语言问题的讨论：《标准与尺度》 / 诗学的深层挖掘与现实的结合：《论雅俗共赏》	
<b>第十二章 朱自清诗学批评的现代建构</b> .....	353
知史通变：以史的观念汇通古今中西 / 钩稽考辨：现代立场的考据释义理论 / 雅俗共赏：学术精神与人文情怀的融合 / 披沙拣金：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诗学批评 / 借鉴西方：比较视域下的诗学阐释 / 结语	
<b>主要参考文献</b> .....	375
<b>后 记</b> .....	381

上  
编

## 朱自清与『京派』文人

朱自清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扬州；一生的事业，开始于『五四』，服务于清华，最后在渴望民主和平的希望中病逝。为了让喜欢他的读者和专门的研究者全面认识既是散文名家又是诗学批评家的朱自清，我们不仅需要回顾他短短五十一年的人生历程，还要进一步考察他的文章与学术。走近朱自清，我们会理解他的寂寞和认真，他的执著和悲辛，他的矜持和温厚，他的清高与狷介……





## 引 言

“出入于‘京派’的诗学批评家朱自清”，这样的研究视角和定位，会让我们重新认识朱自清，特别是他开始于白话新诗创作与批评实践的诗学研究，还能部分还原五四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们美好的交往和各自不同的审美性情。

要讨论这样一个不无争议的问题，多少要回溯“五四”文坛的历史变化，特别是“新月”和“京派”文人聚散流变的时代背景。这首先要从《语丝》的创办及其后来的分化说起。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主编。《语丝》创办的缘起，是1924年10月31日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因刘勉己（时任《晨报副刊》代理总编辑）撤发鲁迅诗稿愤而辞职。之后周氏兄弟和朋友们认为应该自己办份杂志。在鲁迅等人的支持下，由孙伏园组织，筹办《语丝》和“语丝社”，周作人起草了《语丝》发刊辞。《语丝》以刊登简短的杂感和批评为主，设有“随感录”“闲话”等专栏，也发表散文和其他作品，发表自己要说的“真话”，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主要的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章川岛、俞平伯、江绍原、章衣萍、冯沅君、顾颉刚等。《语丝》作为同人刊物，由周作人主编到第三卷第五十期，被北洋军阀查封，移至上海由鲁迅等人主编出版，于1930年3月停刊。《语丝》“随意而发、闲适自由”的文风，后来在周作人的影响下一直延续发展，与30年代初部分从上海返回北平（京）的“新月”文人的文艺主张相结合，加上欧美留学回来的新生力量，且因清华、北大等高校学生的拥戴，在北平形成了新的文学力量和文化氛围，有别于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而在这样的时代转换中，北方文坛，影响最大的，从政治文化思想来说是胡适，从文艺创作思想来说是周作人。

1926年北京军阀专制加剧，新文学作家和文学青年纷纷南下寻求革命和新的出路时，周作人留在了北京。朱自清进入清华不久，也因为工作和个人

性情留在了北京。1927年之后居留北平（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是部分文人对于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双重选择，通过这种选择，他们既可以全身远祸，又可以获得一种他们所企望的冷静清明的新文化建设心境。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复杂的，有着它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后来一直蔓延和影响到30年代许多文人和作家的心态，不论是政治的、文学的，还是日常的情感所向，北平的这些作家与上海的作家之间日渐多了分歧和对立。

五四高潮过去，周作人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导致1926年之后一种完全“消沉”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初充满凌厉之气的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表现出勇敢的批判和斗争精神。另外，他对新文艺的反省批评能够细微地触及人性自由和启蒙价值的深层本质，而其“闭门读书”的人生态度和静守“苦雨斋”的文学趣味，也影响比较深远和广泛。新文学作家的联系是多方面的，而同人的刊物和文集的序跋最能说明相互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俞平伯《燕知草》一书的序和跋自然也说明了朱自清与周作人、俞平伯为文尚友的亲切关系。

周作人写的《跋》，从吴挚甫（汝伦）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纾）的《哈氏丛书》诸序说起，议论“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写跋。”“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张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而且这是在读了“佩弦的序言”之后在《跋》里的议论。“从《燕知草》说到明朝，又从明朝说到革命”，虽然是跑马，“实在我只想说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新散文亦是如此”（周作人《知堂序跋》）。

朱自清和周作人都看到俞平伯文章中所流露出来的晚明气息。“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朱自清的《序》在切要地说明俞平伯这书、这人的特点之后，不过分夸张的批评却是从周岂明不久前写的《杂拌儿·序》来借力，说：“从这点上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文字，尤其是这本书便好。”那么俞平伯的文字“以趣味为主”，人也有着“洒脱”的气息。这是朱自清对于俞平伯的文字和为人的评论。周作人的解释是：“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

致，这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周作人的文章和俞平伯的文章一样，“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这样闪烁而又特别的心绪，在文字间交流，他们的心思是相通的。

虽然朱自清处世为人谨慎小心，但认同胡适和周作人的思想与情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许多文章与学术研究的文字里，非常明显地流露无遗。特别是新文学批评的主要立场，还有新文化建设的学术追求，更明显地倾向于周作人和胡适。1928年，在《那里走》一文中，朱自清最终表明了自己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只不过朱自清因为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加上个人的性格，没有像梁实秋、沈从文那样激烈批评左翼革命文学和“海派”文学，为人和批评的态度比较温和。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京派”文人交往圈子的形成，周作人之外，另一个核心的团结力量是新月社。“新月”后期的主要活动是在南下上海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来说，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当时的上海也不是他们能自由发表言论和存身的地方。因为这里既是“革命文学”——左翼文人的大本营，又是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核心地区，是国民党政府压制“异端”文化力量的主要防范地。“新月”文人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思想上，同时受到来自左翼文学和右翼政治势力两个阵营的打击与压迫。从30年代的政治与文化情形来看，如果“新月”派仍然安营扎寨于上海，继续宣传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那么，其结果比他们在20年代的处境还要严峻。那时候的北洋军阀多少还有些顾虑，但蒋介石急于消除一切影响政治和排除异己势力的特务政策，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因此，30年代初“新月”派文人不得不离开上海，相继北上，很大原因就是躲避锋芒，寻求暂时的安宁。北平，尤其是北京大学，是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文人的根据地，五四以来也是他们读书论学的好地方。重回北大，对他们来说，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另外，30年代北平特殊的政治、文化气氛，对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十分相宜的。北平一方面成为政治上相对边缘化的文化古城，另一方面却有许多现代高校（除北大之外，尚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著名的大学）云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和学子，这是再好不过的可以凭借的学术资源和文化力量。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聘请教授，胡适推荐俞平伯，俞平伯却转而推荐了朱自清。而在进入清华后，朱自清直接得到另一位“京派”文人杨振声<sup>①</sup>的帮助和提携。

共事清华，杨振声比较看重朱自清，系里的许多计划都与朱自清商量而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比较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合。朱自清研究“歌谣”，开“中国新文学研究”新课，贯彻的自然是“新旧文学的贯通”方针。因而1930年暑假后，杨振声就任青岛大学校长，朱自清代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分别几年，杨振声从青岛再次返回北平，杨振声、沈从文准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并得到了朱自清的热情支持，使《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30年代北平文艺批评的重要园地，团结了“京派”文人。

从30年代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昆明回到北平，朱自清和杨振声的良好关系一如既往。正是如此亲近的了解和交往，在所有回忆和评论朱自清文学创作的人之中，杨振声的评价不仅中肯，而且高远：

朱先生自始就注重北平的方言，尤其近几年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在他的文章中，许多的语句都那末活生生地捉到纸上去。使你感到文章的生动，自然与亲切。同时他用来很有分寸，你不觉得像听北平话那末——油嘴子似的。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方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做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

---

①在周作人、胡适影响下，30年代北平“京派”文人形成新的交往圈子，有别于上海和南方作家的文人群体。“如果说北平文坛早期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而在‘京派’形成的历史背景上，杨振声和废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新潮社老作家杨振声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交往和“京派”作家群（或者说北方作家群）的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参见李生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

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发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而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不断努力的。

……

最后，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得那么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久领导我们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

——《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朱自清“文如其人”的创作，是五四新文学最宝贵的财富。杨振声以平实而高远的历史眼光，充分肯定了现代文学和朱自清散文创作所具有的新文化建设意义：“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

朱自清从“平民教育”开始参加新文化运动，因文学启蒙的认识而加入新潮社，所以朱自清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他的创作和学术研究贯彻了民众教育和国民启蒙的崇高理想。“国语”（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最早的倡导者是胡适之先生，而具体领导落实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有赖于杨振声、夏丏尊、叶圣陶等注重国民教育的编辑和教育家，还有朱自清这样终身从事教育的新文学作家。特别是40年代朱自清完成的《国文教育》（与叶圣陶合作）《语文零拾》《标准与尺度》等著作中，充分体现了这方面的卓越见识和研究成果。这与他的散文创作和新文学批评有着紧密的联系。

朱自清特别重视中学和大学“国文”教育，写了大量的文章，将文学和语文（国语）教学研讨结合起来，这方面与叶圣陶的合作也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1940年在四川成都，他完成了许多著述。朱自清流传最广、版本最多的《经典常谈》就是在这样的相互合作与促进中完成的。朱自清去世前，手头正在做的主要工作依然是国文教材的编选工作。朱自清诗学研究既包含了“诗教”传统，又具有文化普及的时代性，40年代的写作和研究尤其如此。

杨振声的批评是切实的，朱自清在写作中特别注重北平的方言，大概也是最早提出以北京话为标准化“国语”的作家，“自己是苏北人，却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sup>①</sup>

这充分体现了朱自清最可贵的平民精神和启蒙思想。但是朱自清关于文学“大众化”和“国语”标准化的批评意见，区别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却是建立在整个新文化建设的人文主义理想之上，具有中外诗学研究和文化批判的深厚基础。朱自清作为五四新文学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少有人深入研究过他稳健清新的诗学批评。他立足现代批评立场的诗学研究，包含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情怀。因为大家太熟悉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评价闻一多和朱自清的那段话，褒奖朱自清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这反而使人们忽视了朱自清秉承五四精神、追求个性自由的人文思想。所以，我们从现代诗学批评家的独特路径上研究、讨论朱自清一生的交往和学术活动，不难发现其出入于30年代“京派”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品格。

所有研究“京派”和研究朱自清的学者，有意或无意在回避朱自清出入“京派”的历史事实。朱自清在新文化建设和新文学批评的自觉努力中自然倾向于师长胡适和周作人。朱自清一生交往最深的的朋友俞平伯、杨振声、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闻一多、朱光潜、沈从文和学生李健吾、李长之等，大部分是“京派”文人。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不仅生活在北平，执教于清华，而且参加了“京派”所有重要的文学聚会和文艺活动，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委，后又是《文学杂志》的编委。

而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胡适一直是“京派”自由文人的领袖人物。朱自清是胡适1917年在北京大学执教的第一届学生。朱自清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夏，从预科投考北京大学本科，被录取在中国哲学门（系）。这年7月，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9月初到北京大学任哲学、英文教授。在哲学系一年级讲授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第二学年在哲学系讲授西洋哲学史大纲。在这两学年，胡适是朱自清的授业教师。笔者在从《朱自清

---

<sup>①</sup>朱自清：《论国语教育》（1946年），《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日记》与《胡适的日记》对照比较中发现，30年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与胡适也有过频繁的接触与来往：凡是胡适到清华作学术报告，或为毕业生作讲演，或胡适应邀参加清华考试委员会会议，朱自清都参与其中，悉心聆听，唯恐失去就教的机会。由此不难看出他对胡适的敬重。同样，胡适对他也分外重视。从有关《文学杂志》创办的材料可以了解，1937年4月，胡适与杨振声为了把在京（北平）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决定筹办《文学杂志》，而朱自清成为“八人编委会”成员之一。毋庸置疑，这个“八人编委会”是胡适所首肯的。其他的几位，如杨振声、沈从文、俞平伯、林徽因等也都是胡适信赖的人。

从以上诸般考察可以说明，朱自清不仅无法排除在30年代以胡适和周作人为首的“京派”文人交往的圈子之外，而且显然是“京派”文艺批评和学术活动的核心人物。

